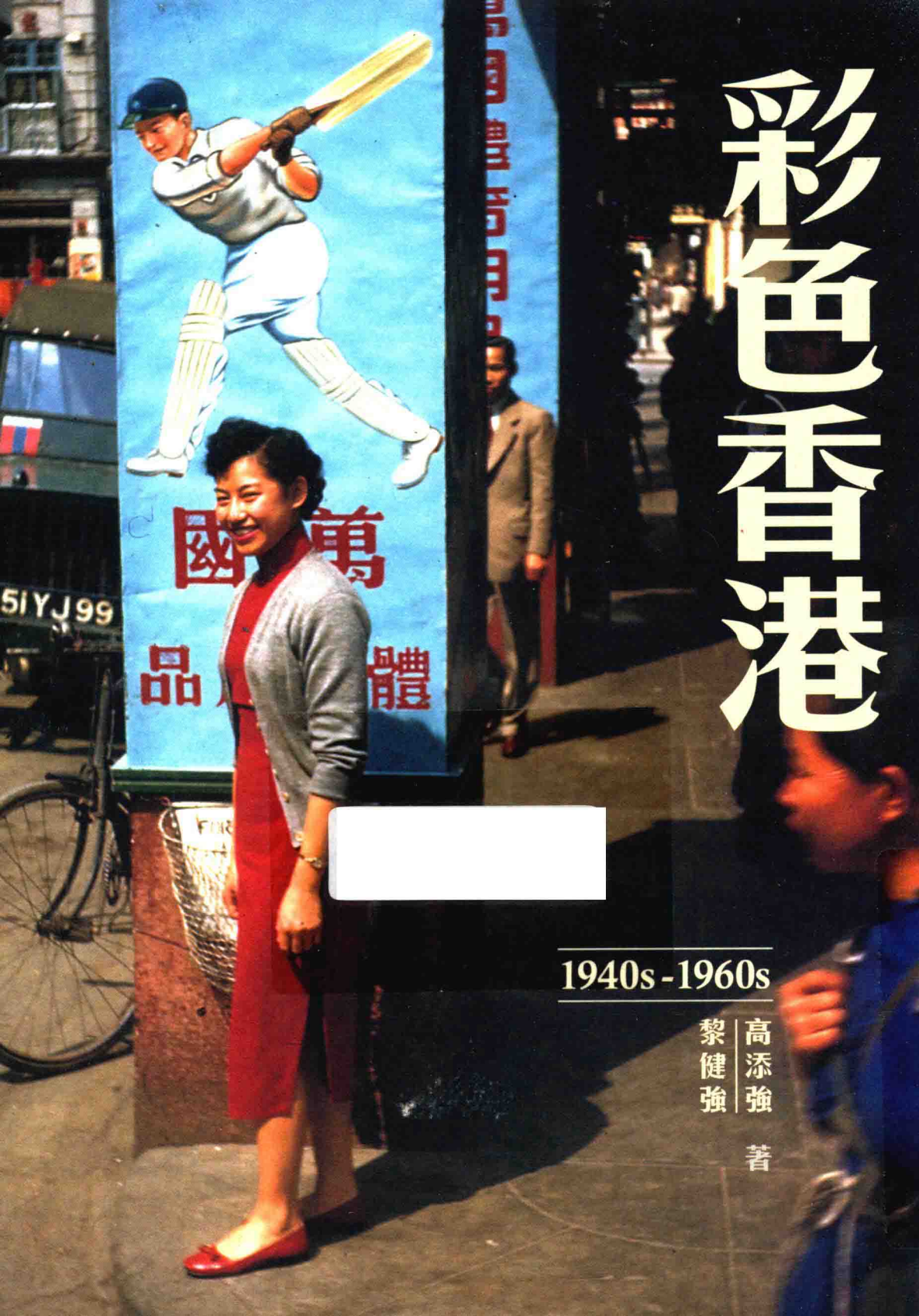


彩色香港

1940s-1960s

黎健強 | 高添強
著



彩色香港

1940s-1960s

黎健強 | 高添強
著

責任編輯 任秀雯
書籍設計 李嘉敏

書名 彩色香港 1940s-1960s
作者 高添強 黎健強
出版 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
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
20/F.,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,

499 King's Road, North Point, Hong Kong

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三樓

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

版次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二零一四年三月香港第二版第二次印刷

規格 十六開 (167mm × 230mm) 一九二面

國際書號 ISBN 978-962-04-3378-8

© 2013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
Published in Hong Kong

目錄

六

一九四零至六零年代的香港 高添強

一四

彩色新香港 黎健強

三三

彩色舊貌

八〇

城市新觀

一二八

生活點滴

彩色香港

1940s-1960s

黎健強 | 高添強
著

劉潤和博士《香港走過的道路》合撰者

香港歷史上，一九四零至一九六零年代是一個十分重要而深刻的轉折期，危機處處，挑戰頻頻，充滿屈辱血淚之痛，出亡求生之哀，內憂臨門而方寸頓失，生活逼人而欲哭無淚等等。以上所說，並非虛言，細細數來，如一九四一年日軍侵港，接着是三年多的日佔時期，一九四五年中英相爭出兵重佔香港，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，大量民眾為避亂而湧入，其間民生困頓求存，食不足而居不安，一九六六及六七年的動亂等等。雖是如此，這個轉折期卻又成就了一九七零年代以來香港經濟騰飛的奇蹟。高添強及黎健強以其敏銳的歷史觸覺，把握了這個深刻轉折期的跳動脈搏，並以稀有的彩色攝影圖像刻劃出當中種種不同的細節，實在很值得向讀者推介。

丁新豹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首席教授

一九四零至六零年代是香港從廢墟中重新站起來，以更大的步伐邁進的年代。沒有這段復元及休整期，便不會有其後的騰飛和輝煌。不少香港人的上一代正是在那些年避難而來，在這片土地上重建家園。物質雖貧乏，但不乏發憤圖強的決心和堅韌的毅力，這正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因素。本書以精闢的文字及難得一見的彩色老照片，縷述並展示了這個時期的香港的吉光片羽，對於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，它會勾起他們不少往昔的回憶；對於年輕的一代，可讓他們認識到父祖輩當年經歷過的喜與憂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香港何嘗不是。

ISBN 978-962-04-3378-8



HK \$118.00

9 789620 433788



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


彩色香港

1940s-1960s

黎健強 | 高添強
著

目錄

六

一九四零至六零年代的香港 高添強

一四

彩色新香港 黎健強

二三

彩色舊貌

八〇

城市新觀

一二八

生活點滴

一九四零至六零年代的香港

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，重創香港。淪陷前充滿活力的中國南方轉口港城市，戰後千瘡百孔。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時，戰前約一百六十萬的人口銳減至六十萬，數以十萬計的居民和難民病歿、餓死或遇害。受破壞的樓宇總計超過二萬座，整個城市面目全非。金融、工業生產、漁業、糧食、燃料，以至公共交通等，莫不百廢待興，而戰後人口劇增，令情況更趨嚴峻。

面對各項迫切問題，以夏慤少將為首的軍政府，採取了一系列過渡性措施，令香港社會逐步回復正常。自一九四六年起，經濟漸次復甦；一年後，對外貿易額已經超越戰前水平，因戰事而沉寂的港口重現繁忙景象。香港已完全從戰爭中復元，再次成為亞洲與歐美之間的主要轉口港。

一九四九年，中國內戰進入尾聲。香港立法局在數月之間通過了多項法案，包括《人口登記法》、《驅逐不良分子出境條例》、《公共秩序法例》、《社團登記條例》、《修訂一九二二年緊急法》等，其中後者規定「港督會同行政局，依據緊急法令所頒布各種法令在與其他法律相抵觸時，可以凌駕其他法律」，意即必要時政府可以有法不依。這些法令或多或少造成當時社會不安的氣

氛，隨後內地和香港邊境封鎖亦令居民與內地產生前所未有的隔離感。

不過對一般市民來說，更大考驗接踵而至，香港轉口港的業務再因戰爭戛然而止。

一九五零年六月韓戰爆發。同年年底，美國宣布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；半年後，聯合國亦執行同樣措施。港府加強進出口管制，貿易自此一落千丈。對外貿易不振使香港的金融、保險、航運等行業呈現不景，工商企業紛紛倒閉，失業人數驟升，社會秩序亦變得不穩。

困境迫使香港必須尋找出路。香港很快走上出口工業的道路，商人和工業家以勞動密集的紡織、成衣等輕工業為先驅，充分運用來自上海等內地城市的資金和人力，積極開拓歐美市場。要注意的是，以輕工業為重點的新發展，並非由政府大力推動促成。當時官方的態度仍是把香港定位為貿易港，當局既沒有準備以工業發展引領香港走向現代化，也沒有通盤計劃協助工業。事實上政府擁抱的是不干預主義，對一些配合工業發展的基本措施，如加強普及教育或中學分流以培訓工商界所需的人才等，一概付諸闕如。

到了一九五零年代末，製造業產品出口在本地出口總值中首次超越轉口貿易，這清楚表明香港已從轉口港轉化為工業城市，維多利亞港再度成為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。這段時期一方面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關鍵年代；另一方面，東南亞其他地區大都經歷政治動盪，此消彼長，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得以加強。

香港的出口輕工業以勞工密集為主，例如紡織品和塑膠製品。這些產品雖然質量普通，惟因價格非常低廉，在世界貿易的低檔市場中有很大的競爭力。當時的工廠規模大都非常細小，佔地不足一千平方呎，僱用十數工人的「山寨廠」比比皆是。

這類小型工廠，可說沒有任何現代工業生產模式的影子，反而更像很多新移民家鄉的手作坊，對工人來說，適應上也因而沒有太大困難。在觀塘、新蒲崗、葵涌等工業區於一九六零年代中期出現以前，大多數工廠都位於民居之中，工人往往就在住宅旁、行人路上或橫街窄巷中工作，自然很快便與附近的居民打成一片。除工廠生產外，外發工亦非常普遍，一家大小往往在狹小的居室埋頭苦幹。

一九五零及六零年代的香港，其實是一個存在於市區的農業社會，整體來說社會沒有秩序，居民粗獷、普遍教育程度不高、貧困卻守望相助。上百萬的居民，從家鄉來到香港，與陌生人一起木屋或石屎森林中工作、生活，賺取微薄的工資養活自己和家人。他們不再務農，然而很多人的思想上仍離不開舊日的農村生活——雖然他們已成為工業社會的一分子。

製造業迅速發展，帶動了地產、建築及金融業。從一九六零到一九六九年的十年間，本地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三點六。及至一九六九年，人均總產值達到四千七百五十七元，排名於當時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前列。

表面看來，這些數字確實使人振奮，然而背後卻是另一番景象。不論在勞工法例、居住、醫療、衛生、教育等範疇，香港均遠遠落後於其他已有一定基礎的工業化地區，貪污猖獗更令市民生

活百上加斤。

香港在一九六零年代已轉型為工業城市，可是聊勝於無的《勞工法例》根本說不上對工人有任何保障，即使簡單如欠薪、解僱之類的勞資糾紛也無法在法律層面解決，一般工人亦不知道如何申訴或怎樣向資方爭取權益。香港的工人運動雖發展得很早，不過在一九七零年代以前，工會政治掛帥，並非主力為工人謀福祉，而籌組的活動大都為彰顯其政治立場；相比之下，為勞工階層爭取權益只屬次要，結果是當遇到不公平對待時，工人往往申訴無門。

香港市區的人口密度非常高，以一九六零年代初來說，每平方英哩的人口已逾二十萬，甚至遠超以人口稠密見稱的印度德里（同時期當地每平方英哩的人口還不到十四萬）。根據一九六一年人口調查結果，在三百一十多萬人口中，約一百萬市民的居住環境惡劣，其中超過一半（五十一點一萬人）居於木屋；十四萬人居於床位；六點九萬人居於騎樓或閣仔（cocklofts）；五點六萬人居於天台；五萬人居於店舖、車房或樓梯底；二萬人於街頭露宿；一點二萬人居於地牢，還有一萬人居於攤檔及洞穴（stalls and caves，後者可能指石石間的罅隙）。這些數字尚未包括艇戶、棚戶，以及人均面積只有二十四平方呎，設施異常簡陋的徙置區人口。

即使租住私人樓宇的房間，情況也好不了多少。舊式戰前樓宇的房東（或二房東）一般把樓層分租，一層樓宇的住客數目往往高達數十人，「一家八口一張床」便是當時的寫照。很多家庭甚至連屬於個人的床位也沒有，需以輪流方式使用床鋪。部分位於市區中心地段，如灣仔的樓宇，房東為求多收租金，特製的「碌架床」可高達六層。廁所一般每層只有一格，而且大都沒有抽水馬桶，晚上由「夜香」工人處理穢物。還有廚炊設施都是公用，以致不少住

戶寧可在床邊甚至床上煮食以避免爭執。又因當時使用的爐具大都是以木柴為燃料，到了燒飯時間，室內空氣便異常混濁，至於垃圾的處理更是一大難題。在擠迫及惡劣環境下生活，加上活動空間狹小，一些小事如取水、爭用廁所、小孩哭鬧等，很容易引發鄰里間的衝突，甚至打架。

醫療方面，直到一九六零年代後期，香港最大的威脅是肺結核（肺癆），部分國際調查甚至提出，以人口比例來說，香港的肺結核發病率為全球最高。直到一九六零年代中期，每年仍錄得一點二至一點三萬宗的新病例，這還未包括大量沒有向官方醫療機構呈報的個案。專家估計香港的成年人口中，高達百分之二的居民需要接受肺結核治療。在各類傳染病中，肺結核的死亡率最高，以一九六三年為例，因傳染病去世的市民佔整體死亡人數百分之十二點八，當中百分之八點九為肺結核病人。

香港極度惡劣及擠迫的居住環境成為肺結核的溫床，此外如營養不良、隨地吐痰、吸毒、沒有使用公筷習慣等，均使情況進一步惡化。對很多低下層的病人來說，他們面對的壓力不單來自疾病本身，還有其他人甚至家人的歧視，很多病者更害怕因此失掉工作。事實上，不少中下層家庭的貧窮原因之一，便是因有工作人口感染肺結核而無法工作。

除了肺結核外，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流行的疾病還有白喉、傷寒、小兒麻痺症、麻疹、水痘、痢疾、霍亂、瘧疾，以及性病等。整體來說，香港雖然沒有饑饉問題，不過在一些貧窮社區，由於部分家庭的收入仍不足餬口，小童營養不良的情況並不罕見。外國志願機構經常在較多低下層學童就讀的學校派發奶粉、麵粉、煉奶、芝士之類的救濟包。其實對很多中下層的兒

童來說，他們並不知道芝士是何物，因而鬧出把芝士當肥皂洗澡的笑話。此外，也有很多家長收到救濟包後，隨即變賣以求得到一點額外收入。

教育方面，香港的文盲率到了一九六零年代已下降。一九六一年人口調查顯示，報稱受過教育的人口佔百分之七十五，其中男性為百分之九十一，女性為百分之五十八。與以往相比，絕大部分的適齡兒童都有入學機會，惟其中不少未待畢業便輟學工作，尤以女童為甚；至於水上居民的子弟，與過往一樣，大部分仍無法上學。

一九五零及六零年代，政府的教育重點在於擴展小學，中學雖然增加了三數所官立學校和其他的補助及津貼學校，但總數仍遠低於小學。私立中學因此乘時興起，當中大部分意在牟利。隨著小學畢業生人數持續上升，官、津、補的中學卻沒有相應增加，公私校人數的差距因而越來越大。以一九六六年為例，私立中學學生共十三萬人，官、津、補則只有五萬，而當時的適齡人口（十二至十六歲）總數約為四十二萬，表示即使包括公私校在內，在學的中學生只有約四成，其中能完成課程的則更少。由於大部分中學屬私校，對很多家長來說上中學的負擔相當沉重，不少中下層甚至中層的家長都無法送子女入讀。事實上，當時政府雖然視小學教育為基本權利，卻或多或少把中學教育看作一種奢侈品而不是基本需要，因此無意擴展中學教育，當然財政考慮亦是重要因素。

直到廉政公署成立為止，與不少地區一樣，香港曾是貪污的溫床。不論政府內外，貪污風氣十分嚴重，甚至成為揮之不去的社會病毒。有貪污的高級警務人員更毫不諱言，「收規」是生活中的一環，就像早上起床，晚上睡覺那樣自然。當時集團式貪污在警界最為猖獗，其他

政府機構特別是提供公共服務的，如市政、醫務、房屋、消防、出入境、勞工、運輸、監獄，乃至郵政等部門，也同樣涉及集團式貪污，因而有學者把情況形容為「整個香港是在拿回扣的基礎上運轉」。由於政府沒有嚴懲，貪污之風到了一九六零年代達到氾濫的地步，不單導致社會風氣敗壞，嚴重削弱公眾對政府的信心，也影響了法律和公共決策的執行。

表面上，一九六零年代的香港看似一個璀璨且生命力煥發的殖民地。隨著小說和電影版的《生死戀》及《蘇絲黃的世界》大賣，香港成為全球，至少是歐美國家無人不知的東西方交匯點。不過在看似繁華的背後，緊張的社會氛圍已經到了臨界點。香港於一九六六及六七年因不同原因爆發大規模動亂；諷刺的是，動亂迫使市民在中國和香港之間作選擇，結果大多數市民認同殖民地政府，並前所未有地視自己為一個特殊群體的成員——香港人。

本書的圖片主要是由旅客、訪港軍人、駐港英軍、傳教士，又或作品以旅客為對象的商業攝影師拍攝得來，內容或許未能全面反映香港一九五零及六零年代的社會狀況，不過編者仍希望藉著這些珍貴影像，喚起讀者對香港這段轉折時期的發展的興趣，從而進一步理解我們上一代面對的社會環境和問題。

香港過去五十年來的變化，實在令人驚嘆。

高添強

